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

郑 欣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
——华北农村村民上访研究

郑 欣 著
导师 周晓虹
审稿 马晓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华北农村村民上访研究/郑
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5022-2

I. 乡… II. 郑… III. 农村-信访工作-研究-
华北地区 IV. D63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3199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宗 合
封面设计 李 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4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郑欣 男，1973年10月出生，江苏江都人，1993年考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并分别于2000年、2003年获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03年留校任教，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心理学、传播社会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及当代中国研究。曾于《南京大学学报》、《当代中国研究》、《二十一世纪》等杂志发表“乡村政治研究及其路径选择”、“村民上访问题的理论阐释与构建”、“田野调查与现场进入：当代中国研究实证方法探讨”、“运动中的乡村道德与权力”、“农村群体性事件社会根源研究”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内 容 简 介

本书的选题是以华北农村村民上访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项有关乡村政治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下，引进博弈论的分析视角。通过博弈论的有关理论与观点，重点研究和分析了当前国家、乡村干部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博弈生存关系。

作者针对村民上访所出现的博弈结果以及对乡村政治产生的影响，认为“治访循环”式的村民上访催化了当前乡村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冲突以及权威结构的裂变；并且指出在村民上访的博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与重新建构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回应型制度的变迁与乡村民主社会的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 主 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 编 辑：李茂生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会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鐵性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大年初一，在福建漳州邻近厦门的角美小镇上，我又翻开了郑欣博士的书稿——《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这本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书稿我看了不止一次。

郑欣所以会以“上访”这一乡村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的互动形式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的主题，自然和我这个指导教师有关。其一，我自1995年以来，一直将乡村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之一。因此，对这一领域不仅自己觉得比较了解，有把握给学生一些有用的指导，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投身乡村研究，产生出更多、更好的研究作品。所以，在最初的几年中，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基本上都以中国农村或农民为研究主题。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前后几期的学生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任务，他们能够就此主动进行有益的交流。其二，我自2000年5月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归来后，一直给博士研究生们开设“当代中国研究”的课程，其中有关中国研究的主流范式——国家与社会（State & Society）和主打内容——中国乡村研究都是研讨的主要环节。我想，这样的课程和研讨不会不对学生们的研究产生某种指导或定向作用。

当然，在我给定的乡村研究这个框子中，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具体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我并没有强行的干涉。学生们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有些是他们阅读文献时“读”出来的，有些

是他们从自己的乡村生活的经验中感悟出来的，也有一些是与我或其他同学共同讨论的结果。郑欣的研究主题则与他攻读硕士学位时的研究兴趣有关。那时，受他选定的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也受他自己的业余爱好的影响，郑欣选择了“球迷闹事”这样的标准的集群行为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的选题。我记得，为了收集资料，他不但访问了许许多多的“球迷”（当然，其中也不乏“伪球迷”），而且本人也“参与”了多场“闹事”。后来，他的硕士论文通过答辩交到研究生院以后，研究生院培养处专门通知系里多交了几份（这是十分鲜见的现象），因为那里有许多球迷，他们对这一研究同样也有浓厚的兴趣。

不过，尽管“村民上访”和“球迷闹事”两者都属于集群行为，但这两类事件的性质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与意义大不相同。说得简单一点，尽管有时也会有结构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一般来说“球迷闹事”是由情境性的因素诱发的。以改革开放后第一场也是最为典型的那场“球迷闹事”为例，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占尽天时地利，反倒以0:2输给了并非强队的香港队，这使得体育场内两万名观众由于强烈的失望而产生了愤怒的冲动。随后，球迷们开始起哄闹事，从抛汽水瓶、水果、阻拦车辆直至殴打运动员和过路群众。在这里，每一个参与者即使在足球赛结束前都不一定意识到会有一场骚乱发生，这场骚乱完全是在场的观众受环境因素的左右，相互刺激或互动的结果。

同球迷骚乱相比，村民上访甚至“闹事”，其背后的动因显然要复杂得多。尽管有时导致村民上访的原因也微不足道，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间充满了我们所说的结构性张力。作为乡村政治的研究者，郑欣意识到村民上访的动因与乡村生活中的利益分配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它是村民利益表达的一种普遍方式，为此，他将村民上访视为村民与乡镇干部、国家三者间的一个利

益博弈过程。村民上访不是为了进城“逛大街”，也不是为了单纯的“闹事”，而是为了通过上访这一独特的利益表达方式来保护自己受到不同程度侵害的权益，在这方面它表达了一般的集群行为都具有的基本特点——即参与者都认为凭借集群的力量能够重建正常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权益中，经济利益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但显然经济利益又不是村民们欲图维护的唯一利益。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可以看到，导致村民上访的事件大量集中于减负与维权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由来已久的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在参与农村剩余产品的分配过程中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反映。这种不合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致 2004 年国家宣布将在 5 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包括江苏省在内的许多省份在当年就取消了农业税，我今年春节在福建南靖县土楼访问时，村民们也反映，因为取消了农业税和许多不合理的税费这一两年日子好过多了）；但事实上，在国家的税费之外，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中有些税费虽然征收有道，但具体的计算方式又常常是引起农民不满的原因所在。包括郑欣所研究的河北 P 县在内，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乡村组织以及乡镇村领导，为了有效地筹集资金，或弥补乡镇财政之不足，或干脆多吃多占，都普遍存在高估农民纯收入从而多征收各种税费的现象。这是引发乡村冲突和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导致村民上访的第一要因。就后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自 1987 年开始推行的“村民自治”之后，农民兄弟们的民主和法律意识都普遍提高，他们开始懂得运用各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当他们的经济或政治权益受到乡镇政府、村委会或某些乡镇基层干部的侵害时，他们就会以包括上访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以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公开为重点诉求的村民上访

越来越多。在郑欣的著作中重点述及的李九拨村个案和杨庄个案中，镇党委和镇政府都成为村民上访控告的对象。村民认为他们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通过上访的形式从县市、省甚至中央寻求支持与保护，改变乡村政治生活中的不健康现象。

因为将上访视为发生在村民与乡镇干部、国家三者间的一个利益博弈过程，能够想像到的是，郑欣会将自己的关注重心放在博弈的过程之中。为了能够生动地还原上访的原貌，他采用了孙立平教授倡导的、在社会学界广为人知的“过程－事件分析法”，希望能够将所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过程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或解释源泉。在对上访过程的关注中，村民、乡镇干部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博弈技术及策略运用成为郑欣博士叙述的主要内容之一。村民上访不是单纯的“闹事”，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上访的村民都知道应该运用什么样的策略使得自己的“上访”既合理又合法。这种上访技术的基本运用路径包括：打“情感牌”；从国家的法律、法规中寻求放得上台面的话语权；专逮乡镇村干部的软肋；以及屡试不爽的“炒”、“缠”、“闹”手段。具体说来，打“情感牌”的目的，在于通过获得上级领导、媒介或大众的同情赢得“上访”的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应星博士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一书中会提出，上访承继着国家在土地改革时期发明的诉苦技术，是 1949 年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常规化的渗透方式；寻求话语权，从主观上说目的在使自己的上访活动获得合法性，在“告状”中占据主动，从客观上说则提高了上访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专逮乡镇村干部的软肋，则与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本质有关，它使村民能够在日常交往中抓住干部们的“软肋”，起到监督其行为的作用；最后，“炒”、“缠”、“闹”则是村民上访的具体策略，它们能够将问题扩大化、明晰

化、引发人们的关注（炒），能够使上级领导或部门在不胜其扰（缠）之后“被迫”解决问题，能够通过制造不安定因素（闹）使欲图相互推诿的领导或部门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尽管这些博弈技术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理性因素，甚至到处充满了阴谋和陷阱、充满了胡搅蛮缠，但也是村民们的生存技能的某种反映，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村民们的生存环境是何等的恶劣！他们的上访又是何等的不易！

因为触及的问题相当敏感，又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从郑欣开始将村民“上访”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的主题的那一天起，我就感到他多少有些压力、有些谨小慎微。虽说科学研究无禁区，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所谓的“度”的把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博士论文的撰写中更是这样，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20多年的寒窗苦读到头来会是南柯一梦。在这一点上我理解他的难处和担忧，所以从来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我想，这种担忧的长处在于，它使一个抱负满腔的学子能够少些冲动，更冷静地观察中国的乡村、中国农民的生活，能够发现村民上访活动的一些不那么值得同情的侧面（包括动辄以“上访”相要挟，或夸大事实、小题大做）；但这种担忧的短处则在，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一个年轻学子的血性，多多少少压抑了他对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兄弟的本能的同情。不过，我应当承认的是，尽管郑欣博士因为上述担忧可能多少会有些“一本正经”，对村民们的“上访”多少有些“指手画脚”，但他还是看到“就村民上访本身而言，上访博弈的结果是一个治访循环的过程，其中既会出现合作性博弈，也会出现非合作性博弈，一次上访的结束可能会是新一轮上访的开始；而就村民上访对乡村政治所造成的影响而言，上访博弈的结果则是通过村民的不断上访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来促进乡村社会中的利益、权威与乡村秩序的有效整合，加快农村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从而导致农村回应型

制度变迁与乡村民主社会生成等良性互动。”

我记得，在我的每一个博士研究生准备撰写他们的博士论文时，我都会说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可以写很多论文（如果你准备作一位学者，这可能还是你的必备的生活方式），但是你能只能写一篇博士论文。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地去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郑欣的博士论文，我是满意的。虽然它有着我提及或未提及的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起码它是用自己的心血写出来的。为了这篇博士论文，郑欣在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甚至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中国北方乡村生活了6个月的时间。他用社会学的视角，将他对村民上访的所见所思写了出来，无论对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还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未来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都不无裨益。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郑欣博士记录了中国农村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和必经事件，而这个记录本身也是他自己成熟的某种象征。

周晓虹

2005年春节于福建角美镇

摘 要

我第一次到北京上访，虽然人生地不熟，但无论是在农业部、民政部，还是后来去的国务院信访办，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在领导接待日所遇到的那些大官们，他们待我们可好了，不但耐心地听我们讲解，还问寒问暖，问地里的收成，还关心我们如何平平安安地回家。遇到这样的领导，我当时感动得都流了泪，这才是我们的父母官啊！记得我在临走时握着领导们的手不断地感谢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老百姓做主。

——P县某上访村民语

现在部分群众坏得很，“一封信8毛钱，让你干部跑半年”。群众上访了，你就得去应付检查、汇报，一耽误就是多少天的时间。那我们其他工作还要不要做。我们的工作耽误了不说，村里面只要有人上访，这个村里的所有工作基本上就会处于瘫痪状态：三提五统收不上，税费陈欠没人交、两委班子轮着换、集体事业一团糟。而且上级有时也会不问青红皂白，只要群众去上访就认为是你的错，工作没做好，轻者扣工资、扣奖金，重者还会撤职、调离岗位以及落得个党内处分。只要一有群众上访，他们就是“老子”，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干部怕群众啊！

——P县某乡镇干部语